

宋代江苏私塾教育简论

朱季康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由于人口迁移、工商业户籍认定、科举开放和家族教育传承等多方面的原因,宋代江苏私塾教育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在大量涌现的童蒙教材的支撑以及各层次塾师的辛勤工作下,宋代江苏私塾完成了江苏民间启蒙教育的重任,不仅成为官学教育的补充,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培养出杰出人才,成为宋代江苏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键词:宋代;江苏;私塾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20)02-0088-05

宋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推动,还是科举制度改革对地方求学欲望的增强,乃至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对教育风气的改善,都在江苏得到了印证。宋代江苏^①私塾教育蓬勃兴起,成为江苏最基层的教育力量,为宋代江苏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一、宋代江苏私塾兴盛的原因

“塾”者,本意指家庭办学,所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宋代以前,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宗族或村落私学并未形成潮流,而至北宋官方振兴教育,数次兴学,但皆以官学学校为主要载体,私塾教育则被忽视。实际上,私塾教育在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私人办学被直接以“塾”来指代,以家庭私塾、村落私塾、宗族私塾为代表的私塾教育已然燎原。诚如吕思勉所云,这一时期“教育之权由公家移于私家”^[1]。南宋时期,因政府财政大量消耗于军事开支,故对教育的投入则力有不逮。江苏官学经费投入也受到一定影响,私学无形之中更趋发达。放眼望去,有宋一代,大江南北私塾林立,甚有部分地区俨然“五步一塾,十步一庠”^[2]。江苏自然早得风气之先,广开塾堂,发展

教育。

宋代江苏除了有官学、书院外,还有分布在各地的大量的私塾、义学等教育机构,而私塾中又包括村塾、家塾和冬学等各种私学形式。宋代江苏地区私塾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代北人南移趋势不减,江苏各地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南宋时期,北方士族多有停留于江苏淮扬、太湖一带从事生产者。与此同时,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土地兼并程度加深,中下层地主阶层群体随之扩大,而他们的子女作为接受教育的潜在刚需群体,人数也随之增加。虽然官方所办的官学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其提供的教育机会仍不能覆盖城乡全部应教育对象。尤其是那些不毗邻府县的乡村地区的学子,若想在府县求学,则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兼之官学教育限于自身条件,受政治环境影响较大,时兴时废。在灵活性上,官学与私塾相比也有很大差距,难以满足求学者的多样化教育需求。

其次,宋代逐渐对商业放开,工商业者的身份为政府所承认,其地位也较前代有所提高,还出现了“坊廊户”这样的户籍。淳化三年(992年)三月,宋太宗诏令:“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

^①宋代无“江苏”地域概念,本文所指“江苏”为当前江苏省域范围。

收稿日期:2020-03-05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课题“江苏教育史”(17WMB008)

作者简介:朱季康(1979-),男,江苏扬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者,亦许解送。”那些以前不能入仕的工商业者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而入仕。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群体的子弟有着强烈的蒙学开化要求,而这恰是私塾教育的本意。宋代,在工商业发达的江苏生活着大量这样的工商业者,无论是这些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亦或是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加与流动,都使江苏民间私塾教育的需求大量增加。

再次,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使入仕不再成为门阀士族的垄断特权。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规定,第一次部分地破除了基于官宦血缘关系的等级界限。“中国社会有唐以下,因于科举制度之功,而使贵族门第彻底消失。”^[3]虽然门阀制度逐渐崩溃,但江苏一带传统士族的辉煌家学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延续着崇文的风习,通过师资、生源及教学内容的缓慢调整,逐步以私塾教育的形式继续传衍。

宋代理学的兴起,给学界带来冲击,而儒家学术界的分歧又因门派师承之争演变为政治派系斗争,政界学界皆纷乱不平。一些反对理学学说的江苏籍官员或主动或被动下野。这些官员大部分皆具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回到各自桑梓或养老地之后,有的出于立说抱负,有的出于教诲儿孙,有的出于谋取酬劳,其中不少人开展了教育活动。因他们不能在官学任教,故私塾成为其理想而自由的教育场所。此外,造纸术及印刷术的快速发展,使教育平民化更容易实现,这也降低了私人办学的门槛。江苏作为宋代刻书业的中心,在私塾教材的刻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也助推了私塾的兴起。

宋代江苏私塾教育模式主要以个人塾师办学为主,基本上是一个塾师自己在家或借用祠堂等场所开办私塾,较为富有的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聘请塾师开办家塾也较为常见。此外,家族私塾也广泛兴起。虽然门阀士族制度式微,但人们的家族情怀依旧浓厚,作为敬宗收族的一个重要手段,家族教育以家族私塾为表现,多以家族祠堂或家族所辟房屋为教学场所开展教育活动,这一教育模式为江苏民间所普遍接受。这些家族私塾有的是家族中有名望者独资或集资开办,有的是以族田收益为经费聘请塾师对整个家族的子弟进行教育。接受这种家族私塾教育的家族子弟可以免费听课或仅交纳其家庭收入可承受范围内的少许费用。有些财力较为雄厚的家族私塾还对贫穷的族中子弟提供金额不等的教育补助。亦有一种家族私塾

不是对族中全部子弟而是对部分子弟进行教育。这种选择出于举办者或资助者的判断,有些是以子弟的资质品性为参考,有些是以族中子弟的血缘亲近关系为参考,有些则纯粹以举办者或资助者的好恶为参考,并没有定则。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江苏私塾无论是在经费的来源、教学的组织、塾师的聘任还是学生的选择上,较之书院、官学,更加不受约束,具有多样化特征,相对自由灵活。

由于存在着教学目的、师资水平、生源等方面的差异,所以宋代江苏私塾教育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虽然大部分私塾是为普通民众子女提供童蒙层次的教育,难以直接评估其教育质量,但从宋代江苏官学、书院的科举教育及学术教育成就中,亦可隐见江苏私塾教育的启蒙之功。

宋代江苏私塾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宜兴人周葵,“少力学,自乡校移籍京师,两学传诵其文”(《宋史·周葵传》),宣和六年(1124年),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盐城人陆秀夫,在随父迁徙至镇江后,就在镇江本地跟从乡贤学习。“从其乡二孟先生学。孟之徒恒百余,独指秀夫曰:‘此非凡儿也。’”(《宋史·陆秀夫传》)《宋史》评价:“秀夫才思清丽,一时文人少能及之。”景定元年(1260年),陆秀夫考中进士,后为南宋左丞相,英勇抵抗元军。在崖山海战中,背负卫王赵昺赴海捐国,号为“宋末三杰”。家族私塾一般多以科举入仕、传播学术思想为教育宗旨,虽然其总数在全部江苏私塾中占比不大,但以当时教育评价来看,家族私塾因延续了士族家学教育的传统与风气,故育人成效更加直接。在与官学、书院的比拼中,家族私塾不遑多让。例如,苏州人叶清臣,无锡人杜镐、葛官,南京人秦羲,徐州人王晏,常州人张守,扬州人徐铉、孙长卿、崔公度,淮安人徐积等,都是依靠家族私塾而成才的。

二、宋代江苏私塾教育的师资与教学

由于没有像官学、书院那样对教师的身份设置限制,所以宋代江苏私塾教育的师资来源涵盖了上中下等知识分子,既有曾居庙堂之上的栋梁大臣,也有辗转乡野的求食蒙师,相比官学和书院的师资队伍,人员较为庞杂。

宋代江苏私塾里的教师,一些是政治理念与当政者不合,或受排挤而被罢黜或辞官回乡的官员。

如彭城人刘颜,“举进士第,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龙兴县,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学。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宋史·刘颜传》)。再如苏州人王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遂退居乡里,招徒讲学。还有一些官员或因年迈,或因其他原因,致仕返乡后,主动为民间教育发挥余热,如宝祐年间,沈义甫致仕归震泽镇,建义塾讲学。更多的则是一些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他们以私塾授徒为谋生之途。“北宋中叶学塾状况,大抵贫士以教蒙童为生。”^[4]这些人中,有暂且为之、勉以糊口、等待时机、随时脱身者,有终身教馆、启蒙乡儿、乐在其中、志以为此者,也有心比天高、挣扎糊口、郁郁不得志而教馆终身者。

江苏私塾的塾师群体人数众多,经历不同,想法各殊,境况际遇多样,学识阅历也有天壤之别。其中虽然不乏学术精深、教养丰厚的名师,如徐州人刘颜,“采汉唐奏议为《辅弼名对》。著《儒术通要》《经济枢言》复数十篇”(《宋史·刘颜传》),但资质平平的教书者仍占大多数。《宋史》曾记载十二岁的丹阳人邵亢及其十岁的同乡王存受到“乡先生”的赞誉,“乡先生见者皆惊伟之”(《宋史·邵亢传》),“乡先生见之,自以为不及”(《宋史·王存传》)。在很多史料中被称呼为“乡先生”者,大率都是这些从事蒙学教育的普通教书者。

较之前代,宋代私塾在教育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接受私塾教育的学生年龄多以六七岁为主,绝大多数是男生。塾馆里的每个学生受教育年限因人而异。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对每个学生受教育年限的规划都不会很长,尽管有的塾师希望其弟子中能有出类拔萃、专心攻读者,或至少有多延长一些学习年限者,然读书的好苗子和愿意付出的家长可遇不可求,通常情况下,这种愿望多被学生家庭中长辈的眼光和经济压力所摧毁。此外,即使是有些志向的学生在私塾启蒙后,也更倾向于在官学、书院里继续深造。因此,绝大部分的私塾教育都属于基础启蒙教育,这也是大部分家长和学生的看法。但也有少部分私塾,尤其是一些家族私塾,与官学、书院类似,以科举入仕为目标实施精英教育,所以其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相对较长。

既然宋代江苏私塾以启蒙教育为主,那么其教学规模、教学方法必然与官学、书院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规模上,这些私塾的规模大小不一,场所各异。大多为教师一人,学生一人或数人者。亦

有教师多人,学生数十人者。而类似徐州刘颜、镇江二孟先生教学的私塾,多至百人规模,当属特例。

其次,在教学方法上,塾师们一般都围绕识字、阅读、写作三个方面展开教学活动,这是启蒙教育的核心,也是科举入仕或从事他业的基础。阅读的教学,主要围绕教书、背书、理解、讲解等几个环节进行。识字的教学,主要是学习童蒙教材中的内容,适度扩展识字量与文字的学习内容。作文的教学,从模仿范文开始并主要讲授基本的行文规范以及修改程序。在教学过程中,塾师以灌输性讲授为主,辅之指导学生进行反复的练习,以达到教学目的。那种有数个塾师的私塾则有塾师教学内容上的分工,但至今缺乏塾师们联合教学、共同研究的证明,他们的教育方法虽有一定不同,但只是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差别。由于童蒙教育的对象多为少儿,学习定力不够,所以塾师们也需要采取一些体罚措施来整顿维持教学秩序。然而,一些私塾“管训虽严,而群儿亦难免于顽嬉”^[4]。应该说,塾师的教学水平是与教学秩序正相关的。

三、宋代江苏私塾的教材与教学内容

宋代印书业的大发展带来了私塾蒙学教材编写的繁荣。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并列为宋代民间印书三大刻本系列之一的家塾刻本(另两种为家刻本、坊刻本),宋代私塾教材刊印之繁荣可见一斑。江苏作为宋代印书业重要基地,其私塾教材的编纂与发行都有很大的发展,这有力地支撑了江苏私塾教育的发展。

宋代士人们较为重视童蒙读物的编写,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当时的文学领袖如欧阳修、朱熹、吕祖谦等人都曾编纂蒙学启蒙书,例如朱熹编写了《童蒙须知》。他们认识到童蒙教材编写的重要价值,愿意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目前人们所知宋代新编启蒙读物达65种,其中北宋11种,南宋54种,远超唐代所编数量。这些童蒙读物在广大江苏私塾中被作为基础教材而普遍使用。

既然私塾启蒙教育主要是以识字、阅读、写作为主,那么其教材也必须围绕这些方面编写。以识字及一般知识的认知为主要内容的《三字训》《百家姓》《千字文》是江苏私塾中最常见的教材。有学者称《三字经》就是根据宋代《三字训》改作而成,“项安世作云:《三字训》,今亦无传。宋后蒙塾最通行

之读物有《三字经》,其书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吾人尚可就《三字经》推知宋代塾中所读《三字训》之一斑^[4]。而《百家姓》则是宋代最重要的蒙学识字教材,成书于宋初,流传至南宋时期已经成为蒙学的常见教材。“故陆游(1125—1210年)谓农家十月,遗子入学读《百家姓》。盖陆游时其书早已盛行。”^[4]《千字文》在唐代即已盛行,宋代更流行于私塾之中。宋代江苏私塾教材还包括《性理字训》《童蒙须知》《童蒙训》《蒙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史学提要》《训蒙诗》《千家诗》《小学诗礼》《神童诗》《名物蒙求》《小学紺珠》《童卯须知》《训蒙雅言》《训蒙初诵》《事类蒙求》《程子训蒙新书》等。

考虑到教学对象多为蒙稚幼儿,故大部分宋代私塾童蒙读物都具有较强的韵律感,多为韵文排列格式,语言简练,朗朗上口。例如:李翰所编的《蒙求》,以四字一韵;《百家姓》亦以四字为一句,全篇包含了400多句,便于学生诵读记忆。“教童子所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4]但也有一些童蒙读物仍保持死记硬背的俗套,不为学生所喜欢。

有学者认为,“宋元蒙塾之课本,其作用仅在识字”。除基础的识字教育外,对于学生日常文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江苏私塾也有一定方式的训练,比如唐诗和楹联作对的学习。“当时蒙塾不仅读以上所说之字书,亦教唐诗,学作对。”“村塾之读唐诗,由来已久。”“宋代小学于读书读诗作对外,兼须习字。”^[4]

事实上,这些私塾的童蒙读物,除了教学生识字外,也蕴含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社会道德。儒家的伦理纲常学说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为了使这些伦理学说和社会道德的说教更容易被接受,这些童蒙读物在教学生识字外,也通过故事、乡谚、格言、诗歌等形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李翰的《蒙求》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本书记载了先秦至刘宋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对于故事中的每一句,作者还进行了详细的备注,使儿童在学习文字之余,能够增进对历史的了解。再如《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叙古千文》等读物都是介绍古代历史文化的启蒙教材。而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来说,普通的历史故事讲授与四书五经的学习在本质上都属同一种教化,因为所有的历史故事都同样遵循着儒家的道义而被选择出来作为教材的,它们都是对学生进行儒家学说和社会道德的最初教化的重要

内容。此外,也有少许常识性知识被纳入私塾教材。这里面有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章》等,也有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这种对传统文化进行启蒙的读物。而方逢尘所编的《名物蒙求》是这些读物中不可多得的一本。该书主要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名物知识以及家庭、亲属成员进行介绍,略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本教材还对雨、云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内含一些科学元素。可以说,《名物蒙求》的存在几乎是对宋代私塾读物以人文知识为主而自然与科技知识空白评价的唯一反证。

相较官学和书院的教学内容,宋代私塾教学内容不受科举的限制,讲授内容十分丰富,选择十分自由。除了蒙学启蒙之外,塾师也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开展一些相关内容的教学活动。尤其是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提倡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潮流行后,江苏私塾也对教学内容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很多村塾、家族私塾还通过讲授宗约家规来对学生进行宗法与家族文化的教育,其中也不乏一些社会规范的内容。至于农、工、商各行各业的杂学知识和生活常识,也因塾师的知识结构不同,讲授内容各有不同,如吴县人许洞就曾经在私塾学习过“弓矢击刺之伎”(《宋史·许洞传》)。

四、结语

宋代江苏私塾虽然不受官府重视,但它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承担着民间启蒙教育的重任,不仅是官学的有力补充,而且还直接培养出了一些杰出人才。可以说,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宋代江苏教育事业将会缺少广泛的根基和发展的韧性。

参考文献:

- [1]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70-1271
- [2] 王善军.宋代的宗族与宗族制度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4
- [3]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8:149
- [4] 陈东原.我国宋元两代之小学状况及其教材[J].教育与学,1935(5):80-88

(责任编辑:唐银辉)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Private Schools of Jiangsu in Song Dynasty

ZHU Ji-ka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open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other reasons, the education of private schools in Jiangsu province flourished in Song Dynasty. With the support of a large number of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textbooks and the hard work of teachers, the private school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Song Dynasty completed the important task of folk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which not only became the supplement of official education, but also directly cultivated outstanding tal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duc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i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Dynasty; Jiangsu province; private school